



第一卷

ANCIENT KHOTAN

古代和田

——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

【英】奥雷尔·斯坦因 著

M. AUREL STEIN

巫新华 等 译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山东人民出版社

K878.04
20106
1



第一卷

ANCIENT KHOTAN

古代和田

——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

【英】奥雷尔·斯坦因 著

M. AUREL STEIN

巫新华 肖小勇

方晶 孙莉 译

学术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英]斯坦因(Stein, A.)著;巫新华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209-04781-4

I. 古… II. ①斯…②巫… III. 文化遗址-考察-和田地区 IV. 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16158号

责任编辑:丁莉 赵力 崔萌

李宝元 杨刚

封面设计:蔡立国

版式设计:李宝元

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

[英]斯坦因 著

巫新华 等译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格 16开(210mm×297mm)

印张 60

字数 1200千字 插页 17

版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7月第1次

ISBN 978-7-209-04781-4

定价(共2卷) 98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1)82079112

翻译工作组织分工

- 巫新华 全书的翻译组织工作；
前言、正文目录、插图目录、图版说明、图版目录、
引用文献名称缩略语的翻译；
第一至十五章与诸附录正文和引文的人名、地名、
书名、刊名、文章名，以及专用术语的翻译和统一；
全文审校。
- 方 晶 第一至第八章正文翻译。
- 孙 莉 第九章正文翻译。
- 肖小勇 第十至十五章正文翻译。

纪念爵士亨利·于尔上校
这位早期旅行的伟大的阐释者和中亚历史地理的先驱
他的著作是我旅途中最好的陪伴
我怀着深深的尊敬与仰慕
将我旅行所致的古代发现——
这册记录呈现给作为一位学者、
一位作家和作为一个人的他

古物描述由安德鲁斯先生完成。书中七十二幅插图和附录由巴奈特、布舍尔、沙喇、乔奇、弗兰克、罗兹、玛拉郭林斯、拉普森、托马斯等先生完成。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07年

中译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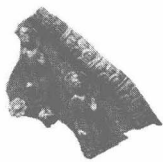
斯坦因于公元 1862 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是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因为他父亲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样做会使小斯坦因能够融入主流社会,拥有接近外界财富的机会,从而前途光明。斯坦因没有让父母失望,他的确获得了探险时期以来最大的文化财富,成为一位在地理探险和考古探险两方面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人。他一生一直坚守信仰,1943 年,当他在阿富汗准备再次进行中亚探险考察时,病重不治,临终之前要求一个英国教会为他举行葬礼。

受西方地理探险时期所宣扬的各种社会成功人士典型事例影响,斯坦因从小到老所向往的都是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和中国唐代大和尚玄奘经行的旅程。他花费生命中很大部分时间学习中西亚各种语言和文化、潜心研究历史和地理、用心编织人际关系,而后再用其余的时间去探察希腊人连同希腊艺术进入中亚的路线,考察汉唐远征军西进道路和古战场,追寻玄奘经行遗迹。因此,他越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要隘进一步研究希腊艺术,唤醒了沉睡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宝库,第一个接触到延伸进入大沙漠的汉长城,首先叩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诸多举措,震惊世界。

斯坦因在 1900 年~1901 年、1906 年~1908 年、1913 年~1915 年、1930 年先后四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第一次探险出版了《古代和田》(考古报告,两卷,1907 年)、《沙埋和田废墟记》(通俗本,1904 年。1994 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二次探险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考古报告,五卷,1921 年。中译本于 1999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沙埋契丹废墟记》(通俗本,两卷,1912 年。中译本于 2004 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次探险出版了《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考古报告,四卷,1928 年。中译本于 2004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反对而中途夭折,最后他综合四次探险写了一本《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7 年中华书局和上海书店联合再版;新译本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此外,斯坦因还出版了一些其他著作。

在上述论著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斯坦因的代表作。其中《古代和田》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和 300 多幅插图、图版及地图,详细介绍了他第一次到中国西部,即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探险的全过程,具有很强的阅读性和资料性。同时这部著作的出版还标志着 20 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研究和昆仑山地理勘测的正式开始,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斯坦因的三部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室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



术,其中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版将上述地区古代各种遗址及其丰富而精美的遗物展现于世人面前,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化面貌和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此外,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种种奇妙的景观。斯坦因用他的鸿篇巨制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因而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于是那些馋涎欲滴的列强学者们和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也紧随其后,纷至沓来。

斯坦因在编写三部代表作的过程中,邀请并集合了当时欧洲各有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对各种难度较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专题和综合研究。然后斯坦因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基础,总其大成,编撰成书。因此,这三部代表作既是斯坦因的专著,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从学术角度来看,虽然现在不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和瑕疵,但其主要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

《沙埋和田废墟记》、《沙埋契丹废墟记》和《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主要是陈述相关各次探险经历,将探险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的读者”。这三本通俗读物以较短的篇幅、简明的文字,清晰地勾画出各次探险的概况、主要发现、重要收获,以及正式考古报告中未载的一些细节和趣闻轶事等,是读者了解斯坦因的探险活动、主要发现和收获,以及其人其事的捷径。

斯坦因著作等身,成绩斐然,现在一些人基于其声誉,对斯坦因大加赞美。殊不知斯坦因的业绩,乃是当时列强垂涎并染指中国新疆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以斯坦因著作中反映出的问题结合《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档案馆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对斯坦因诸多声誉背后的所作所为作一披露,以正视听。

第一,斯坦因是肩负英国政府政治使命的学者。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覬覦窥伺之心”。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列强诸国负有政治使命的各种探险家纷纷闯入新疆,斯坦因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斯坦因“奉印度政府之使命”(时印度政府受英国控制),在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在新疆进行四次探险活动,对此斯坦因在其著作中从不讳言。那么,斯坦因领受英印政府什么使命呢?“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此外,还有一条就是收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中,曾提到他到新疆和河西地区探险的目标和性质,但却未将上述三条包括在内。其实这缄口不言的三条,才是他探险的真实目标和性质,并在四次探险活动中不遗余力坚决贯彻执行之。正因为如此,斯坦因才被英国和印度政府奉为“英雄”,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爵士勋位。正是以此为基础,其学术成果才被褒奖有加,他才有机会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所以斯坦因到新疆探险绝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执行英印政府使命的政府行为色彩。他利用学术为英印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所以“命运之神”才对他“格外垂青”。

第二,靠谎言和骗术,并以行贿官员收买走卒等不正当手段而横冲直撞于新疆大地。对于上面提到的三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早有察觉。因此,诸如对斯坦因的活动要“随时侦察”,“应即查明禁阻”、“遵照部令严行禁阻通行”,“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到处勾留”,“请访属防范,严加监视”等,不绝于书。但是,斯坦因仍然我行我素,到处横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弱,吏政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斯坦因正是乘此,由英国外交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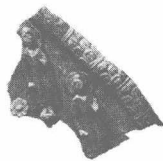


构出面利用外交手段打压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并以“为发扬中国古时威名”，“但求古路，不论考古搜集之事”等名义进行欺骗；同时还用钱物贿赂各级官员，收买走卒为其张目（斯坦因著作中每有流露）。以第四次考察为例，斯坦因就拿出6000美元“为运动新省官员费用”，斯坦因甚至明说“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所以负有监视之责的一些官员，往往以“并无测绘及违约情事”等谎报平安。有的官员甚至以斯坦因有“英、美两政府后援”，不能用“无关实际之考古问题徒伤国际感情”，准斯坦因考察“毫无不妥”，“务请当机立断”，“免误事机”；如若不准，“何以对国人”等言词要挟上级政府。这些丧失民族尊严和国格的腐败官员为虎作伥，是沙漠珍宝流失的我方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虽然已认识到斯坦因以“多谋善窃著闻世界”，“惯于巧取豪夺”，其人“老猾”、“行踪诡秘”，他的话“全系谎言，不足置信”，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惧外、媚外，加之这些腐败官员与斯坦因沆瀣一气，从中作梗，致使斯坦因以及其他列强探险家大量劫掠我国西部文物珍宝，扬长而去。

第三，到处收集情报，散布攻击和分裂中国的谬论。斯坦因利用考古和地理考察的名义，深入新疆各地。所到之处广泛收集当地政府、驻军、民政、民族构成、民情、民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报，对敏感地区还进行体质人类学考察与测量；广泛收集各地气候、水文、物产（包括矿物标本，甚至采集沙子和土壤标本）等方面的情况并绘制高精度地图。凡此所为，有的可以与考古和地理考察挂钩；但是，从斯坦因各种著作中反映的情况看，上述资料早已大大超出学术需要的范畴。

除上所述，斯坦因在著作中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在大量考察材料面前不能否认自古以来中国在新疆行使主权的史实，但是为英帝国妄图分裂中国领土张目，宣扬新疆古代是白人的家园，新疆古代文化西来说，汉人是外来民族，并极力贬低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当时中国官方机构也早已知晓，指出斯坦因侮辱中国，“轻薄中华民族之议论，尤堪发指”；对斯坦因“谓我只知有旧中国，我不管什么是国民党的少年中国之喊叫”，“外国人应不理睬”中国，“以前外国人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合作皆是无聊，而且上当。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我的老经验依然适用，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已临最后之一日”等谬论。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为英帝国主义染指新疆和分裂中国，而充当先行者。

第四，以偷绘高精度地图为己任。斯坦因的三次探险均由英属印度勘探局出资，提供先进设备，配备优秀测绘人员，对所到之处偷绘详细地图。从斯坦因著作中可明确看出，他对测绘地图竭尽全力，比考古探察还要上心。为测绘地图他本人或派员均实地勘察，凡山川等各种地貌，山口险隘，古今军事要地和要塞、古今交通线（包括古今军事道路和小路）、交通枢纽、烽燧（烽燧线即是古代军事警戒线）、驿站，古今城镇和居民点，各种水源的位置，水草分布状况等等，地图上无不应有尽有。斯坦因测绘地图主要集中在第二、三次探险时期，所绘地图囊括地域之广、涉及腹地之深、其详细和精确程度之高、地图数量之多，远远超出考古和地理学术考察之需要（在《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刊布的地图，仅是其所绘地图的一部分），具有不折不扣的军事价值。在列强诸国探险队中，大规模偷绘地图者只此一家，这大概就是“大英帝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的真实含义。对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当时中国政府也非常敏感。在有关斯坦因新疆探险的档案史料中，涉及其偷绘地图的公文最多。档案史料中明确指出，斯坦因到新疆的目的是“偷绘我国地图”，他的活动“当不离军事范围”。斯坦因所到之处，“窃伺关系军务要险地段”，“察看险



要地方暨照绘地图”，“派人分往各处测绘”，“测绘险要”。“其受印度政府命令来华测量”，“自印度入新、甘之军路详细测绘以去”；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所以当时中国政府一再发出“注重国防”，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禁止测绘在案”之类命令，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前面第二条所述原因，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有禁不止，“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

第五，大肆盗掘破坏古遗址，疯狂劫掠大批文物。斯坦因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斯坦因几乎盗掘了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和遗迹，使遗址和遗迹造成严重破坏，所出遗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全部劫往印度和英国。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指出：“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盗取我国先民遗迹，蹂躏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因而一再下令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测量地形，用副中枢，注意国防，保卫文化之至意外”，并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之事发生。最后，由于屡禁不止，故在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之策。但是，斯坦因究竟劫掠多少古物出境，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清楚。有的官员也只能笼统地报告“唯查该游历需用车辆、驼只、马匹甚多。询悉每考查一处，举凡一草一木、石块片瓦之属莫不装载而归，是以需用如此甚多”。此类报告虽然语焉不详，但也反映出斯坦因在明目张胆地进行洗劫。关于斯坦因劫往印度和英国的中国古代文物，至今尚无完整的统计。仅从他在著作中披露的情况看，就已触目惊心。

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等地以及内蒙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大肆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石室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十二章“藏经洞的发现”、《沙埋契丹废墟记》第六十五至六十九章中，详细描述了他及其帮凶蒋师爷如何巧施阴谋诡计，编撰故事，鼓动如簧之舌，欺哄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以几个小钱步步紧逼王道士上钩，诱骗宝藏，并津津乐道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在夜色中一次次偷走大量精品。最后装满24箱（一箱的重量相当于一匹马的负荷）写卷、5箱绘画等艺术珍品，全部运往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说此后法国伯希和到藏经洞时，藏经尚有15000余卷，绝大部分被其劫往法国。后来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又从敦煌石室盗走部分精品）。斯坦因开盗窃敦煌石室宝藏之先，他与伯希和盗走敦煌石室宝藏的行径，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震撼了中国，也使世界为之震惊！

总之，遭斯坦因劫掠之后，新疆汉唐时期的遗址大都遭到破坏，遗物几乎荡然无存，敦煌宝藏国内也仅剩少许。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坦因乃是中国西部古遗址（斯坦因窃取石窟寺的文物比德国人少，暂不包括在内）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

综上所述，最后就如何看待斯坦因的著作问题，再指出以下六点。

第一，斯坦因的三部代表作，其实就是对他盗掘的遗址、劫掠的遗物进行的整理与研究，他的三部通俗读物则是这种模式简化后的随笔性作品。因此，斯坦因的著作以资料为主体，其价值以资料取胜。在斯坦因的著作中，资料与研究是皮和毛的关系，资料是斯坦因学术成就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古代遗迹和遗物本身价值所致，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第二，斯坦因所处时代，是现代考古学的初始发展阶段，其学术报告存在科学性缺陷。另外，由于是挖宝式发掘，往往抢时间，赶“任务”，放纵民工乱掘滥挖（这是遗址遭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意处理复杂现象或根本未观察到重要现象，加之斯坦因又经常离开现场（大多与测绘有关），因而其所获资料较乱。斯坦因的考



古报告即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以自己在现场所做的记录、日记和工人口述情况为线索,按流水账的方式报道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情况。所以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不规范,重要遗址的完整形制布局及其各部位间的关系,遗物组合构成情况,遗迹之间、遗物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等,绝大多数未交代清楚。因此斯坦因的断代,大都是以钱币、文字资料和少数他能够掌握时代特征的遗物进行推断,研究结论也存在商榷余地。不过,我们应将斯坦因的著作放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水平中去考虑。正是这样,我们前面才给斯坦因的报告以较高的评价和一定的谅解。

第三,就斯坦因的著作而言,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前面已有总体评价,不赘述)是斯坦因坚决贯彻执行英帝国所赋予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与其个人学术素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许多欧洲学者集体智慧的总汇。斯坦因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资料夹叙夹议,研究成果不太醒目,但仔细阅读仍能看清楚。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应当从学术角度来看。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眼光进行分析,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同时也必须弃其糟粕(主要是斯坦因的立场决定的),特别是他利用遗迹遗物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国的谬论,必须坚决批判,以肃清影响。

第四,斯坦因的著作和学术成果,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国主权,疯狂盗掘中国古代遗址并劫掠中国古代文物为前提的。因此,斯坦因的著作即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国主权之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读斯坦因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教训,勿忘国耻。

第五,经斯坦因盗掘和劫掠之后,凡其所涉足的遗址均遭严重破坏,遗物也没有了。所以记录这些遗址和遗物的斯坦因著作,就成为今天研究新疆汉唐考古学的基础资料,其有关敦煌石室宝藏的记录又是研究敦煌学的基础资料之一。这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假斯坦因之手造成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历史事实。

第六,根据前面介绍的情况,对于研究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以及一些相关学科的人,或那些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读。毋庸讳言,斯坦因的著作对上述诸学科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斯坦因著作也是外国列强劫掠我国珍贵文化财富的自供状和遗失文物的详细清单,是我们追索海外遗珍的强有力证据和线索。

20 世纪上半叶,在塔克拉玛干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斯坦因的工作都可以算是地理学考察与考古学考察相结合的第一人。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传教士、职业探险家和自然学家,从前都来过这里无数次,但却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考古学者前来考察。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博系,与和田地委与行署的关心与支持下进行的,翻译过程自始至终都得到程振山、孟凡人、张铭心、张玉忠、卢平、张明强、车玉生等先生的无私帮助。山东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付梓付出了大量心血;本书汉译本前言中还部分采用孟凡人先生为笔者翻译的《沙埋契丹废墟记》所作序言之观点,在此笔者代表所有译者向上述单位和先生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再者,由于我们的组织能力和翻译水准所限,译文一定存在许多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巫新华

2009 年春于北京王府井大街 27 号考古研究所

前 言

这部著作意在详细介绍我于1900~1901年间在中国新疆(Chinese Turkestan)塔里木盆地的南部,尤其是和田地区进行探险的考古学成果。这次探险是奉英属印度政府之命进行的。我已尽力使这册记录准确和详尽,以便与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以及我收集的观察资料的意义相称。那些发现是我长途苦旅的报偿,观察资料则与这个国家的早期地理与文明相关。考虑到这部著作已发展到这样的长度,而且当其结尾时,我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的另一件新的吸引人的工作恰逢开端,请允许我对我的介绍语有所节制。我将仅限于简单记述导致我形成计划并使计划得以实施的背景环境,并对我最终细致地描述结果时所处的环境条件做一些必要的解释。

1891年,鲍尔(Bower)上校从库车(Kuchā)获得了著名的写于桦树皮上的古代经文。从它被印度学学者得知的时候起,我的目光就转向了作为考古学领域的中国新疆。但是,那时和那以后的好多年里,繁冗的管理工作留给我的余暇极为有限,我得不断同困难作斗争才能确保完成我在卡勒哈纳(Kalhana)的《克什米尔编年史》(*Chronicle of Kashmir*)方面的工作。这使我不可能在我所关注的方向上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

1897年春天,当我编年史方面的工作结束在望的时候,缘于与现已故去的布莱尔(Bühler)教授的私人联系,我得以见识了鲍尔所发现的古代桦皮书上的重要发现。那些桦皮上有用法卢文(kharoṣṭhī)书写的早期帕拉克里(Prakrit,古代印度俗语——译者)语佛教文书,其中一部分是莱恩(M. Dutreuil de Rhins)先生在和田逗留期间获得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文书残片(其中有的已被辗转传到了圣彼得堡),由塞纳特(M. E. Senart)先生刊布,立刻被认定是至那时为止所知的最古老的印度语写本。我因此决定将和田作为我的目标。

另外一些同样获于和田地区而已经流传到加尔各答去的物品,使我更加确认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霍恩雷(A. F. R. Hoernle)博士(他曾通过不断的努力破译并阐释了首次从库车发现的古梵语文书)敦促印度政府向它在喀什噶尔(Kāshgar,即今喀什——译者)、拉达克(Ladāk)和克什米尔的政府代表发布指示,令其收集出自塔克拉玛干(Taklamakān)地区的古物。霍恩雷博士本人在加尔各答负责这件事。这次收集所增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1895~1897年间得到的,包括写本和其他古代遗物。这些遗物据说是当地的“寻宝者”从和田绿洲,以及和田绿洲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毗连地区的某些地点找到的。然而,没有关于这些东西的准确来源或那些所谓的出土地点的特征的可靠信息。由于缺乏证据,许多有史学意义的问题得不到解答。而且不久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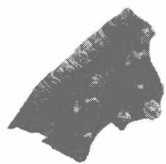
这些获得品的大部——包括写本和写着各种未知文字的拓片——的真实性也受到怀疑。这些问题和怀疑恰恰是急需进行实地的正规探索的最好证明。

我于1897年离开欧洲之前,曾与布莱尔教授讨论过这类探险的计划。那之后,我时常想起这位令人追思的学者的话。与他的相处总是给人以激励,但那段时间却是我命里注定与他相伴的最后时光。他对我的计划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同时也估计了具体的困难。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必要的自由和资金。我当时在旁遮普(Panjāb)大学担任的职务责任重大,不允许我为计划的实施进行准备。1898年春天我在克什米尔获得了必要的具体数据之后,便请求霍恩雷博士帮助,以确保我的项目能得到印度政府的财政支持。极大地得益于霍恩雷博士对这项计划的浓厚兴趣,我于1898年8月提交的正式申请获得了批准。由于我那时所任职务的迫切需要,我只能将旅行的第一段计划限制在6个月之内,于1899年进行。总支出估计为6 800卢比(Rs.)。印度政府和旁遮普地方政府同意共同负担这笔费用,分别支付总数的2/3和1/3。

1899年春天,最后的许可书刚刚收到,我却又于此时受印度教育部聘请担任加尔各答伊斯兰大学(Calcutta Madrasah)的校长。这一职务使得我的旅行必须延期,而且与之相关的官方安排也得重新考虑。非常幸运的是,如同马克沃斯(Macworth Young)爵士治下的旁遮普政府一样,孟加拉(Bengal)政府在现已逝世的约翰·伍德班(John Woodburn)爵士(他是一位东方研究的热心朋友)的领导下,清楚地判断出我计划实施的探险的重要性。这样,由于职位改变所引起的条件变化,使我反而能延长时间限度,扩大旅行规模。印度政府于1899年7月最后批准了修改后的计划。我的代表团因此可以从1900年6月起在中国新疆逗留一年。我能支配的资金是11 000卢比(约合733英镑),完全合于我的探险预算。其中,印度政府的份额增加到6 500卢比,旁遮普政府善意地保留了他们的资助,其余部分由孟加拉省提供。

令我深为满意的是,尽管遥远的距离、自然的障碍,以及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进行工作所不可避免的种种不确定性构成了困难,我的全部计划却严格地在批准的预计时间和费用之内完成了。当然,如果不是印度勘测部协助我进行了研究中一项重要的附属工作,我可能就无法把费用限于上述数目之内了。为了精确地确定古遗址的位置,概括阐述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对我查访的地区进行勘测工作就变得与我的直接任务紧密相关。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只有充分利用这趟旅行所能提供的每一个在更广泛意义上进行地理工作的机会,我才能实际地把握该地区的自然条件,而这正是正确地诠释它的过去所必需的。

乔治·格瑞(George Gore)上校——已故印度勘测部部长(Surveyor General of India),欣然为我提供了该部的帮助。他友善地同意配备给我一名有经验的本地勘测员巴布(Bābū,改为拉依·沙合普,Rai Sāhib)·拉姆·辛格(Rām Singh),提供必需的勘测仪器设备,同时拨出2 000卢比(约合133英镑)的资金用于支付勘测作业的额外费用。得益于这位部长的帮助(他的出色协助我后面另有机会提到),我才能够在整个旅行期间实施包括平板测量(plane table)、航空观测(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和三角测绘法(triangulation)在内的连续而系统的勘测。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些勘测加以指示和监督。在其结果之上,我又附加了自己在群山中间进行的照相制图测绘(photogrammetric survey)的成果。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此报告的附图“和田及毗连地区地图”中。那份地图的比例尺是1英寸比8英里(1:506 880——译者)。我在本书中讨论了许多与今已弃置沙中的古代遗址相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学者和地理学学者同样会感兴趣。而我则希望那份地图能够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



对寇松(Curzon)勋爵领导的政府以及孟加拉和旁遮普地方政府所给予我的慷慨照顾和帮助,我在此记下我深切的感激之情。承蒙这种照顾和帮助,我才能获得长期以来一直向往的机会,在一个新领域内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我也才能获得如此大的自由度,因而能完全把精力集中于学术追求。然而,我还必须感激命运,它让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并以丰硕的成果回报了我历尽艰辛的劳动。我的权威学者同行们认为,即便相对于那些慷慨供给我的金钱与设备而言,我的成果亦堪称丰硕。不必在此一一细述那遍布我旅程各阶段、根本绕不开的严重困难和危险——它们可以很轻易地阻碍我去实现目标,只要细读一下我的《个人叙述》^①,就会明白在塔克拉玛干工作时需要对付的种种障碍的性质和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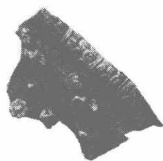
没有中国地方政府的积极合作我不可能成功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冬季向沙漠进军期间,我无论需要什么,都是他们帮我解决。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两位可靠的朋友,即当时管辖和田和于田(Keriya,也译作“克里雅”——译者)的按办(Amban)潘大人(Pan Dārin——音译)和黄大老爷(Huang-Daloi——音译)。他们随时准备尽其所能帮我解决困难。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们感激愈加深厚。有一个时期,他们的国家曾与欧洲处于冲突状态;他们自己又不能指望由于帮助我而获得任何名誉或物质上的回报,但他们的关注与善意始终如一。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种天赋的、真正的历史感,他们对玄奘(即唐僧,伟大的唐代和尚,我宣称他是我的前导)又有着传奇般的记忆,这都大大有助于我向他们阐释我探索的目的。话说回来,省政府一开始就对我的工作持同情态度,这主要归功于印度政府在喀什噶尔的代表马继业(G. Macartney)先生所给予我的有效支持。他的个人影响确保我获得了不少优越条件,我在喀什噶尔停留期间,这位神通广大(accomplished pvii)的朋友惠施于我的那些具体帮助和指点又使我多方受益。为了这些,以及他在远方追随着我探险的那种守望和关注,我谨在这里记下我持久的感激。

探索所得科学成果的价值可以留待从这几卷书的记录中加以判断。但我感觉我有理由提一下其他东方学者对这些成果的慷慨承认。他们的意见或记载于第13届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的正式议案^②,或可从著名学者,例如福彻(M. M. Foucher)、列维(Sylvain Lévi)、塞纳特和其他人的综述及其他评介中体现出来。这种承认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也帮助我承受了后来详述结果时所不可避免的辛劳。

我所提到的困难很大程度是由于所实施的考古作业的广度,得到的发现和所进行的观测的种类的繁多,以及我感觉应赋予我的记录工作的眼界和特色。从下面这件事可以充分看出田野工作的广度。仅仅是古和田地界,我细致勘察或发掘过的故址或遗迹就散布于东西直线距离超过300英里以上的区域中。古代遗迹的种类之广泛同样令人惊讶。遗迹断定年代前后跨度至少为11个世纪,其本质与特征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多样性。在勘察的地点中,代表性的例子有极不寻常的风蚀的塔提(Tati),就是沙漠边缘地带的土壤有可能发生重大自然变化的一个典型例证;有密集的古定居点留下的、深埋于许多个世纪积累的黄土之下的“文化地层”;有塔克拉玛干流沙经过地区中各式各样、保存程度各异的废弃建筑结构。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遗址被确认为寺庙、防守堡垒、宫殿(Sarai)或私人住所等,其间有古代艺术品和工业品遗存,这使得我们能够研究一度在

^① 见M.斯坦因:《沙埋和田废墟——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和地理探险远征的个人纪行》(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以下简称《沙埋和田废墟》)。第一版,伦敦,非舍尤文(T. Fisher Unwin)出版,1903年;第二版,哈斯特与布莱克特(Hurst and Blackett)出版,1904年。

^② 同上书,第xiii页。



此地兴盛的早期文明的许多方面。

出土的考古物品极为丰富和新颖,这必然使正确地加以记录和诠释的任务变得相当困难。但还有尤增困难的地方——当然,这同样增添了这件工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和它的科学意义——那就是古和田艺术品所揭示出的文化影响的广泛多元性。我们曾由中国文献中得知,早期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的佛教是由印度直接或间接地传入的,这一点当然一直是被肯定的。但我们丝毫也没有料到竟会发现那样令人瞠目的证据。在尼雅(Niya)遗址,我们发现了大量写于树皮和皮革上的佉卢文文书。它们显示出在公元头几个世纪里,印度语言和文化在此地的行政与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①在丹丹乌里克(Dandān-Uiliq)和安迪尔(Endere)废弃的寺庙和僧院中发掘出了婆罗米(Brahmī)文字的文书,它无可置疑地证实了直到公元8世纪末,和田仍有梵语佛教文献的存在。同时,在一些由准确证据断定为公元3~8世纪的废墟中,发现了一长系列的古代灰泥雕塑、壁画、画板和木雕。它们结论性地证明了印度最西北地区的希腊佛教艺术(Graeco-Buddhist art)曾在和田扎根并得到过长期持续的发展。

如同塔里木(Tārim)盆地其余部分一样,和田地区在汉唐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发掘的地点,中文木简文书和纸质文书,中国的绘画、钱币、工艺品等等有趣的发现,充分表明中国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而中国古代文明也一定曾对其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在从中国到妫水(Oxus,即今阿姆河——译者)盆地的古代商路上,和田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一事实无疑也有助于增强古代中国文化对和田的影响。而和田早期与遥远西方的关系,也必归因于此种商路联系。在尼雅,我们发现了许多古代佉卢文文书,文书的封泥上面捺着古典的印记。这一系列的印记以令人惊异的方式证明了此地与西方的关系。^②在丹丹乌里克遗址的佛教寺庙里有晚于尼雅遗址5个世纪的佛教绘画,经复原,我们能够发现无可置疑的模仿波斯艺术的痕迹;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不寻常的犹太—波斯文书。这些证据都令人信服地证明着此地与西方联系的连续性。最后,在安迪尔已毁坏的城堡和寺庙中发现的古藏文写本和绘画,证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吐蕃这方面的影响。在7世纪以后,这种影响可由史学上已经证明的观点来说明;但在更早的时期,种族联系也曾导致这种影响,这在目前却还未被清楚地认识到。

即使有所有这些外国影响在起作用,但还是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和田及新疆的其他地区在前伊斯兰时期都拥有自己鲜明而确定的文明。如果没有当时的记录和遗存,仅凭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偶尔述及,或中国朝圣僧人的简单笔记,我们是不可能重新构建那已逝文明的主要方面的。我们同样不能指望那些偶然发现、远远得来、出处不明(如果不是可疑)又没有精确考古证据的东西真的能投光送亮,帮我们了解那已逝的文化环境以及它所目睹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考古探险得到的材料却可以帮助我们复原逝去历史的有趣篇章。为了保护并正确地诠释它们,只是进行发掘,然后在博物馆里安排官样语言称之为“考古学进展”的陈列是不够的。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应该保存一份所有实地考察的准确细致的记录,并将这样保存下来的证据以最大的可能性细致而完整地加以刊布。这是科学考古学神圣原则对任何合格的考古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对于学者同行来说,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为其他人计,我忍不住要引用弗林德斯·彼特里(Flinders Petrie)教授——一位有着无比经验的考古学探索

① 见本书,第十一章,尤其是第381页起。

② 见本书,第373页起。



者——在他令人钦慕的《考古学方法与目的》(*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一书中很形象地写下的警告：“离开那仅仅是去抢掠了一番的发掘地，毫不设法去发现它的历史，或去发表也许有助于将来从事此地或此类研究的学者的东西，就是将机会从能够适当运用它们的人的手中攫走，而后又将它们扔弃。”^①

我不得不再指出威胁着和田沙漠所有古代遗址、遗迹的风蚀破坏作用，和更多的由“寻宝者”之手构成的严重危险。近年来欧洲收集者的搜求刺激起了这些寻宝者的行动。考虑到这种危险，又因为知道，“不论是和田还是新疆的其他部分，即使具备气候的保存能力，在古遗迹的保存量上也根本不可能与像埃及那样的国家相匹”，我总感到被鞭策着，要去做不知疲倦的努力。还是基于同样的思虑和知识，我强烈地感到有责任“用最大限度的细致去工作，记录细节，完整地发表每一样东西”^②。

和田地区的特殊环境又在上述责任中加上了紧密相关的另一条，即“以一定的详细度记录我对于该地区现代自然环境和人种分布(ethnography)观察”的必要性。对于批判地研究历史的学者，不论他处理的是书写记录，还是过去的古遗存，地理条件和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都必须加以考虑。他同样不应忽视种族遗传为正确理解一个人群及其文明的过去所提供的有用引导。新疆不是地球上的一处像希腊、埃及或印度那样容易进入的地方。如果说最近这些年，尤其是通过赫定(Hedin)博士对其地形的阐释工作，情况已有很大改观的话，那么仍有大片的地区，要想了解当地环境、道路等等细节知识，仍基本上只能通过实地考察。而要了解该地区的人种分布，情况就更是如此。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常常在讨论和早期的经济及人种状况相关的问题时，感到有必要记下现代自然和人类学的事实。同样是这些考虑使我关注我的《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的发表。在那本书里，对于地理学兴趣的以及其他显现人群生活与特性的观察，为了更合于公众口味而都被适当地细致化了，所以它可以当做阅读目前这部著作有用甚至是必要的入门准备。

为了正确地研究古迹问题就需要留意地理与人种分布背景，我预期的任务还包括了参引任何流传下来的当地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这些记载的绝大部分要从散布于中国历代史书和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纪行的段落里爬梳。我常常痛感遗憾，我那有限的语言学知识里不包括中文，这就使我无法直接参阅原文。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应当试着给出新疆、喀什噶尔和和田地区历史的简要概貌。这部分内容包含于本书的第三和第七章中。^③ 幸运的是，沙畹(M. Chavanne)新近出版了《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 iue (Turcs) occidentaux*]一书，为我们打开了唐代中国强盛时期中亚历史精确而有价值的丰富的信息宝藏。书中包括了对史书中大部相关记载的校订和注译。而有关和田的中文记述，我在《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和地理探险的初步报告》^④中参考使用了阿伯尔·李穆萨特(Abel Rémusat)的一篇短小而出色的文章，本书也引用了其中的全部引文。我花了很多精力把在当地得到的地理与古迹知识与史书记载联系起来，希望由此得到的历史概述能对读者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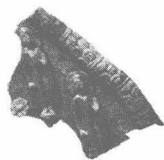
在如上原则下准备我的详细报告，无疑是一件很累人的工作。而难以保证足够的余暇就更增加了我的困难，而且大大延滞了工作的完成。1901年7月，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我把我的考古出土文物送到了大英博物

① 见《考古学方法与目的》，第179页。

② 见弗林德斯·彼德里书，引文出处，第175页。

③ 见本书，第57-77页、173-189页。

④ 见《和田史》(*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巴黎，1820年。



馆。那之后,国务大臣欣然批给我为期3个月的“特别责任假”。不过这仅能使我暂时安排好收集品,并准备同年秋天出版《初步报告》^①。那个时期一结束,我就只好返回印度。其后的半年中,作为旁遮普的学校督学,我的繁重公务排除了任何从事学术工作的可能性。然而我又很幸运,经旁遮普政府建议,并且无疑受到寇松勋爵的影响(他友善地对我的探险成果表现出兴趣),得到国务大臣首肯,印度政府批准我的代表团于1902年5月赴英国,以便在欧洲专门学者的帮助下详细地写出我的研究结果并安排出版事宜。

从各方面讲,我都深深感激总督和印度政府对我和我的工作表现出的慷慨关心。但正如我曾担心的,代表团只能滞留英国7个月的期限对于我将要完成的任务来说是太不够了。经国务大臣征得印度政府同意,又好意地两次追加了共10个月的时间。凭着各方面所进行的极大努力,我因此得以在留英期间完成了关键性的工作。这些工作要求我必须能极为方便地接触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考古发掘所获文物,并便于寻求到所需的对发掘品进行细致研究和复制等各方面专家的帮助。可是由于从事此工作时限不定,工作的难度便又大大增加。不过,在离开英国之前,我仍然设法安排好了所有各种质地和样式的出土文书的释读和出版工作;准备并送交给出版社数量庞大的古代文物插图;监督审定根据探险考察工作中的原始勘测而进行的地图绘制等工作;最后但并非最不important——出版了我的《沙埋和田废墟》一书。该书从许多方面说都是目前这部著作的一个必要准备和补充。

1903年底回到印度之后,在做西北边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和俾路支(Baluchistān)教育总督学和考古勘测官之余,我把每一点闲暇都用于继续撰写我的报告。尽管我做了上述所有的努力,如果不是印度政府为了让我能在1906年春继续进行在中国新疆的探险,并因此得以从上年10月起获得6个月的特殊责任假从而使我腾出手来的话,我的报告可能还要延迟数年才能发表。正是在喀什噶尔那些忙碌的冬月里,当新的旅行的许多具体准备工作都要人分神照顾时,我写出了这部详细报告的大部分正文。

对于这部考古探险的最终报告为何不能早一点问世的原因作了上述说明之后,现在我怀着愉快的心情转入以下的致谢部分。我感谢那些学者和朋友,没有他们的合作和热心帮助,这部作品不可能以现在的规模面世。其中,首先得提到我的艺术家朋友——曾任拉合尔(Lahore)的梅奥(Mayo)艺术学校校长,现任巴特西(Battersea)理工学院艺术系主任的安德鲁斯(Fred H. Andrews)先生。自我从中国新疆回来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以他的勤奋努力有效地支持我的工作。他对于古代印度艺术,尤其是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广泛知识,对于许多古老的东方艺术品的深刻了解,以及他本人高超的艺术修养,使他在协助我对所收集的古代文物进行整理、描述和绘图方面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资格。本报告中包含的所有古代文物详表全部出自他的努力。当然,因为我曾加以检查和修正,所以对它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单个物品的出处的信息,我应负完全的责任。没有安德鲁斯先生不厌其烦的精确和完整描述,我大概根本不可能在身处距藏品6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完成我的报告。另外,这个记录文物详细情况的表会使读者,尤其是研究中亚早期艺术与工业史的学者感到受益,因为根据印度政府的决定,全部考古发掘品将由加尔各答和拉合尔的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分别收藏。这种安排使得原物之间的比较变得困难,将来的研究如要利用它们,主要还是得借助描述表所提供的细节和插图

^① M. A. 斯坦因:《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和地形探险的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以下简称《初步报告》),印度部(India office),伦敦,1901年。